



过一些关于道术方面的作品。其他政论性的文章还有《海行日记》《南海日记》等。

《海行日记》是郑观应做轮船招商局会办时，为巡查沿江沿海各城市招商分局局务所写的日记。他先后到过牛庄、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汉口、重庆等城市，把沿途所见有关商务、水程、进出口货物和漏卮利弊种种情形，随时随地记载下来，汇聚成《海行日记》二卷。并把他考察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小吕宋、暹罗、西贡等地的情形，附录于书后，作为商务的参考和借鉴。

《南海日记》是郑观应奉彭玉麟的委命，到西贡和南洋各地，侦探法国在越南活动的情形所写的日记。时间在1884年（光绪十年）的五六月间。这次南游先后到过西贡、新加坡、曼谷、槟榔屿、马六甲、柔佛等地。郑观应此行所负的主要使命有二：一为赴西贡侦探敌情。二为说服暹罗不要助法国攻打越南。他的日记除了记载这两方面的事情之外，对沿途行程、遭遇也记载颇详。每到一地，对于该地的地形、气候、物产、民族、历史背景、政治组织、风土人情、华人概况等均有所记载。这次南游，增加了郑观应的海外见闻，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如邮政、鸦片、南洋诸地之苛待华人、设领事以保护侨民、华工、议院制度等问题，在《南游日记》中都曾讨论过。

郑观应，这位久经商场的老将，其心系国家安危，怀揣忧国忧民之情，为此，他著书立说，阐明其维新思想和观点，为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奔波。他的维新思想反映了十九世纪末逐渐产生和形成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心声，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徐润自编年谱

20世纪初，一位在上海滩被称作“富甲王侯”的商人，在静安寺附近兴建了一座私宅，名为“愚斋”。今上海的愚园路由此得名。

这位富商名叫徐润，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1838年出生在今珠海市北岭村的一个望族世家。

在珠海也有一座愚园，这是徐润从小长大的地方。但是，从这座乡村草木苍翠的愚园走向繁华的大上海的愚园路，徐润也许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杰出代表。

19世纪后期的中国，在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一个与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边缘地

带。一大批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中国人，在这里成为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先驱。

徐润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房地产商、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他奠定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机器印刷厂，他还参与创建与经营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的大型煤矿等众多工商业领域。

徐润的父亲在清朝做官，珠海愚园那种充满田园情调的生活，富足而又恬静。但徐润并不满足。15岁到上海就学未成，而进入洋行当学徒，十几年后升为英国大洋行宝顺洋行总买办。他一边给洋人当买办，一边自己开设丝茶栈给洋人供货，以两种身份赚两份钱。后来被李鸿章看中，委任为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总办是今珠海籍另一大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在这里任职十几年，他和唐廷枢一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轮船招商局。同时他们还创建了仁济和保险公司、开平煤矿和唐胥铁路。

这一期间，徐润还是上海茶叶大王、丝业大王和地产大王。他极具商业头脑，能捕捉住商机，早在上海开埠时期，他就看中了黄浦江边的荒滩，后来他在这里兴建了十六铺码头和法租界金利源码头。他在沿黄浦江地区买了很多空地，后来都成为外滩中心商务区。徐润对上海开埠时期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小，上海商界都认可徐润的贡献，选举他为上海丝业同业会董事、上海地产同业公会董事。徐润是有名的上海地产大王，晚清政府还委任他为上海商务总会会长。

举个例子来说，徐润的生活就具有典型的中西结合的特征，他是宝顺洋行的大买办，年轻时就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在经营航运、矿业等实业中，也必然与外国的商人和技术人员打交道。他是最早深入西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国人之一，然而他的生活却打上了民族与国家的烙印。

英国人莱特这样描述徐润：“身着长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长袍与瓜皮帽一中一西，加上剃过的头既像晚清臣民又不像，活脱脱中西结合的打扮与装束。徐润的婚娶喜庆等又是晚清的习俗，1858年“冬令回家婚娶”，“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杏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徐润的饮食起居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徐润在家乡香山和上海、天津乃至苏州、镇江都有宅园，其中苏州和上海的住宅正是中外风格迥异的代表作。苏州有一园名未园，“泉石深邃，春夏之间池水如锦，秋光老圃尤多晚香”。像一幅“拳山勺水”的人间居处画卷。未园典型的中国式园林特征，充满着浓郁的传统文人气息。徐润把它作为“憩息之所”，常与亲戚朋友在此“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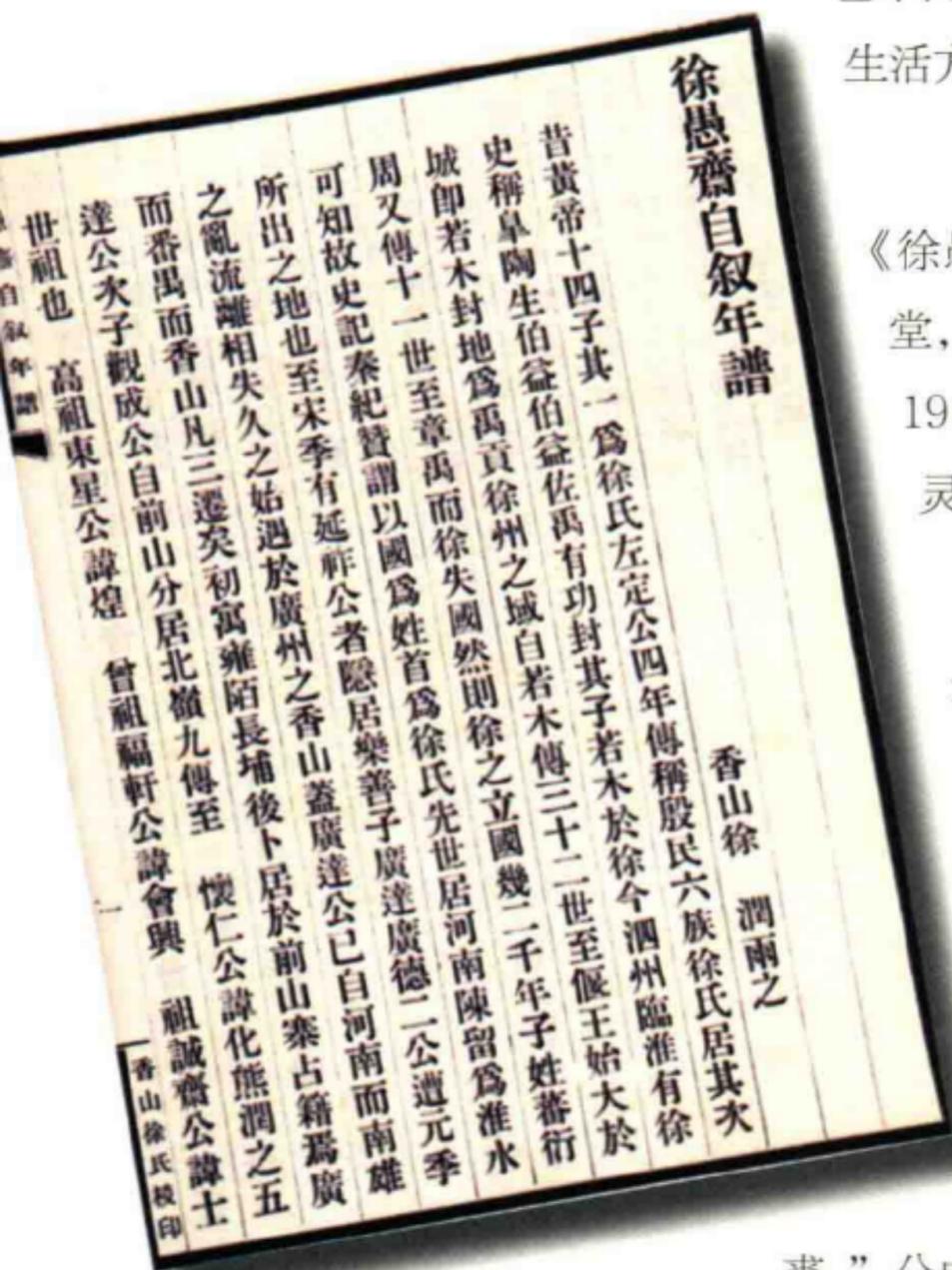
之乐事”。而徐润在上海的住宅则迥然有别，该宅位于仁济医院旁，英租界山东路265号，雕梁画栋、华丽异常，门窗镶嵌大理石，地板光洁如镜。“与其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又有花自海外来者，不能知其何名，作花无常信，香色界要常有。”连光绪帝的老师参观徐润在天津大沽的花园时都认为有“夷气”。“归赴徐雨之花园，园小而曲折，然楼阁几案皆有夷气。”可见，徐润的生活方式与欣赏水平已不同于旧式的商人与官僚，而接近于西方上层人士的生活方式与水准。

晚年的徐润组织编修《北岭徐氏族谱》，撰写《徐愚斋自叙年谱》，派人回故乡北岭村修建村道、祠堂，修筑“竹石山房”（即“愚园”），捐资办义学。1911年3月9日，徐润在沪逝世，终年73岁，其灵柩从上海运回北岭村安葬。

《徐愚斋自叙年谱》是徐润晚年自撰年谱，除介绍其生平经历外，更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体现清末商业发展的重要历史，也是研究买办不可或缺之史料。

徐润的《徐愚斋自叙年谱》及《上海杂记》。《徐愚斋自叙年谱》计10万字，忠实地记录了徐润的实业生活。《上海杂记》是徐润长期与欧洲朋友交往“共广见闻，以冀集腋成裘，”分成一册。这两部著作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徐润晚年所撰《徐愚斋自叙年谱》是了解晚清政治、经济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书籍。其中所锁定的一系列关于洋务经商的种种细节，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洋务运动一些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都有画龙点睛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影印



式的白描。《徐愚斋自叙年谱》目前所知有两个版本，一是徐润家族自费刊印于1927年，香山徐氏校印的民国版本。此版采用古籍常用之竖排右读，无标点，若从封面到年谱正文结束，不包括所附《上海杂记》，约11万字，自叙其生到卒的经历与见闻。第二个版本为台北的文海出版社于1978年列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影印出版。

徐润在晚年靠回忆与口述完成年谱，从书稿中明显可以看出其青壮之年所作所为，事迹平平。晚年尤其是年届古稀入主轮船招商局，其年谱中则有详细记录。年谱的记叙，模仿中国史书编年体裁的逐年铺叙。徐润从15岁离开香山北岭老屋，跟随四叔父徐荣村到上海宝顺洋行去做学徒。他从事商业的路子，几乎是当时香山许多贫苦人家孩子的老路。徐润踏入上海滩后，先从学徒生涯开始，扫地递茶粗役活计自不可免。但他勤奋学习也昭然纸上，“黎明即起，习字数百，又学算于阙”，其间“学异国方言聱牙佶偃”，他勤劳刻苦，办事练达，深受洋人大班器重与同行师伯的喜欢。

从年谱记载徐润每月薪水的变化，可看出其业务的进步。进宝顺洋行头一年，“学丝缕秋学茶”，月得俸薪本洋10元。17岁“仍充丝茶等职薪水二十元”。18岁“仍充丝茶等职兼佐理阿多臣栈务薪水二十八元”。21岁“月给薪洋五十元，俾无内顾之忧”。

由上可以看出，徐润在沪上不到五年时间，已由学徒升任帮办，兼管账务，全面接触洋行的管理业务，并赢得了洋行东家的信任和同行的爱戴。24岁起，徐润即受宝顺洋行英籍大股东韦伯所托，全面主持该行在中国的各项业务。几年之内，宝顺洋行已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大本营，在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各开放口岸收购土特产、推销进口洋货的庞大经营实体。

徐润在收购和推销中不仅从洋行东家得到为数不菲的薪水，还按商业惯例有回扣可收。年谱记载，徐润从22岁起，即与曾寄圃等人合资开办绍祥字号，承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等生意。洋行的历练、合资、独资、投股合作的商业磨合，使徐润经济眼光明显高人一筹，心理承受能力亦随之提高。个人投资中获得过暴利，也出现过大亏其本。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中烈火与炼狱的训练，使25岁的徐润，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只用了10年时间，就成了上海滩的商界闻人。

同治二年（1863），26岁的徐润已在沪上购“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在房地产投资上，徐润不仅有先见之明且确有过人之处，不仅在上海，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亦购地建房，并敏锐地指出：“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





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由于徐润在洋行业务中所训练的国际商业眼光，使得他深谙商业经济的规律，成为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巨商之一。

同治七年（1868），31岁的徐润乘宝顺洋行股东拆股之机，遂自立门户成立宝源祥茶栈。徐润前后侍身洋行充当买办16载的历练，使他从此有了一个国际的视野与非同凡响的胸襟。最后摇身一变而成了洋务运动中实力派人物，也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

作为一个独立的商人，徐润与一批粤籍亲友和沪上同行不仅在商界施展拳脚，互通声气，相互帮手，还与挚友唐廷枢等担任洋药局、仁济医院以及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堂、元济堂、格致书院等慈善机构的董事，并与沪上大亨盛宣怀、胡雪岩、叶仕翘、唐翘卿等同办公益善举之事，这一批几乎全是买办出身的商人在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拨中，逐步成长为民族资本的先行者与弄潮儿。

同治十二年（1872）七月，徐润“奉北洋大臣李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会同唐道廷枢办理”。36岁的徐润从此进入了人生的鼎盛期，踏进了人生重大转折乃至坎坷的门槛。

从年谱上可以得知，徐润从25岁起即花钱买官，“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26岁“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报捐花翎”，27岁“在上海皖营捐输分局报捐以员外郎分发兵部学习行走”，29岁“苏军分援浙闽各省，叠克城隘，转运出力案内，蒙前爵阁督部堂李奏保加四品衔”，34岁“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等事务，35岁“在皖捐局捐升郎中，仍分发兵部双月选用并捐免保举”，36岁“奉北洋大臣李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总局”。

晚清之际，捐官制度已成为清廷明码标价的公开惯例。发了财有了钱的富商巨贾，或为了光宗耀祖，或为了炫耀世人，纷纷花钱捐官。这从某种层面上也折射出经商者在心理上，有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渴望。

权臣李鸿章一直在关注着上海滩的粤商大佬级人物唐廷枢和徐润的动向。同治十二年（1872），李鸿章先后任命唐廷枢、徐润为濒临破产的当时最大的国有企业——上海轮船招商总局的总办、会办，并对其进行官督商办的重组。36岁的徐润，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协助他的挚友唐廷枢，对轮船招商总局进行了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筹资招股，兼并收购，轮船招商局终于起死回生。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在其为国筹划中，也实在是殚精竭虑。上海轮船招商局是防止洋人垄断，维护国家主权的深谋远虑。筹办之际用人不当后，才起用唐、徐二人，李鸿章说：“唐藉徐之财力，徐藉唐之才力。”唐、徐二人互相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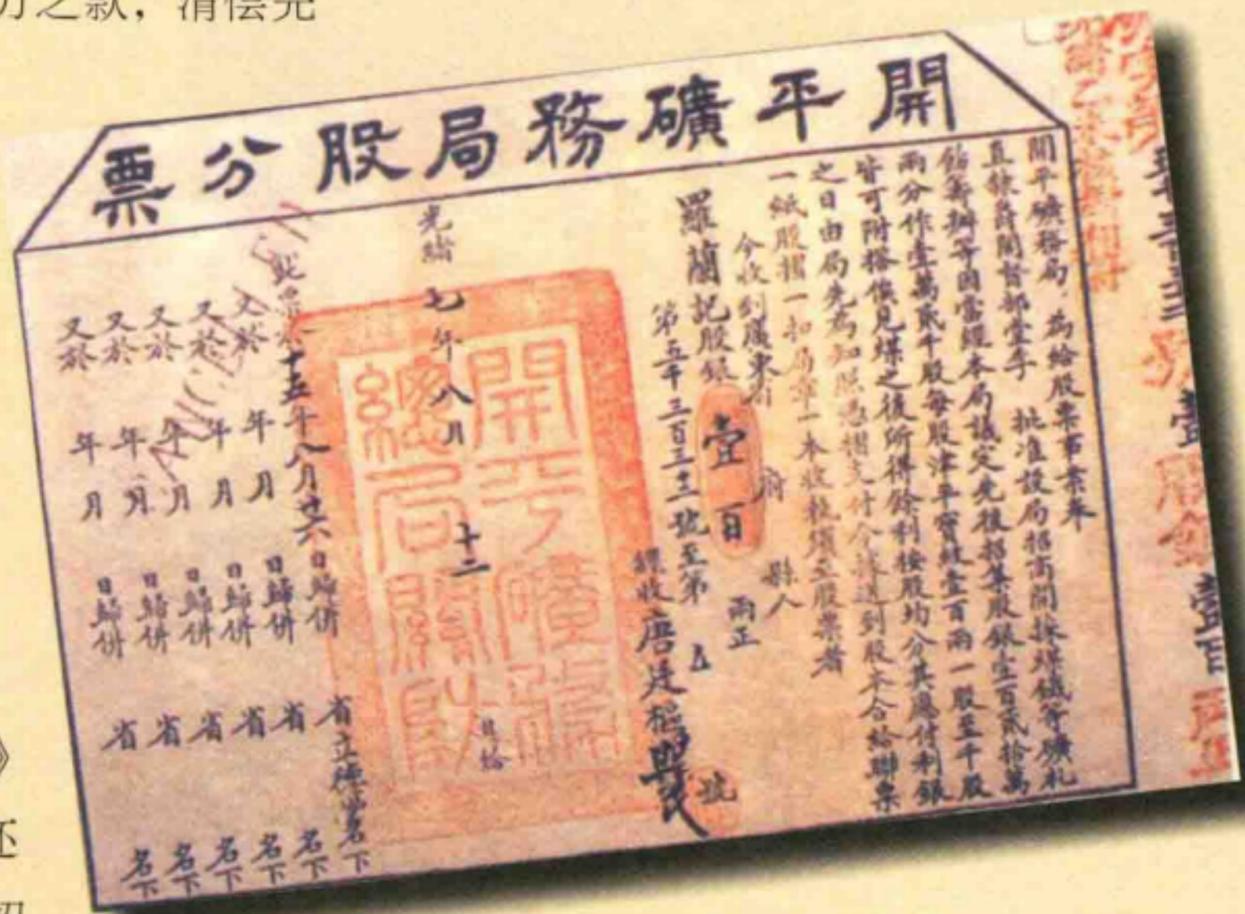
心，唐有宏图，徐有耐力。二人搭档，可谓是珠联璧合。唐主外，徐主内，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果然不负众望，成了晚清中国工业经济上的一艘旗舰。

人算不如天算。46岁的徐润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多事之秋。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军舰一度企图封锁吴淞口，上海滩经济顿陷混乱，市面萧条。在这一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中，年谱记载说：“举市所有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巨家如胡雪岩、刘云杞、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徐润所经营的大宗地产、股票等投资价格暴跌。与其有往来的钱庄、票号计22家之多，均因资金周转不灵纷纷找徐润清账。

轮船招商局内部，人事纠纷斗争激烈，明争暗斗亦使徐润焦头烂额，瞻前不能顾后。徐润毕竟久经商场，在这关键时刻，徐润将上海的房地产、股票等物业集中作价“三百数十万成本之产业，摊作二百余万之款，清偿完结”。在轮船招商局内之欠款计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八钱七分五厘，亦用地产、花红等予以结清，而轮船招商局尚欠徐润六十九两九钱三分五厘。

徐润在年谱中记录的一些“事略”，实际上反映了他对商业发展不顺的焦虑。如，光绪九年《记地亩股票合业始终兴败事略》详细记录了徐润资产明细即抵债还款的明细事项。而《宝源祥赔结招商局各数事略》则条理分明地叙述他与轮船招商局之银钱往来。徐润在其笔墨中不无心痛地记录了官商合办企业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官商不分，赏罚不明的许多难言之隐与钻心之痛。

徐润在内外交困、双重打击之下，毅然壮士断臂，以自己的资产，捍卫商人的诚信与做人的尊严。盛宣怀等人借端发难，到北洋大臣李鸿章处打



光绪七年发行的开平矿务局股份票





小报告，在“弊窦滋生，几难收拾”的争权夺利环境下，徐润与唐廷枢联名辞职。李鸿章亦禀奏清廷将徐润革职。

徐润年谱中对光绪九年之变故亦耿耿于怀，地产、股票旋即升值，其价达2000万两白银。为了尊严，义无反顾地清债还钱，虽可惋惜，亦为痛快。他的母舅当时甚至认为，以徐润的执拗与刚烈，“非服毒，即投河”。然而，徐润自励自强，“在润此时只有一个定字，立意终不负人，忍耐至今，亦渐渐过去”。他还自撰警句：“放宽肚皮袋气，

咬定牙根吃亏。”对盛宣怀的评价，“口蜜腹剑，良有以夫”，一笑置之。对李鸿章的为官平衡之道，虽心存不忿，也只是用“偏听独任，痛心千古，付之一叹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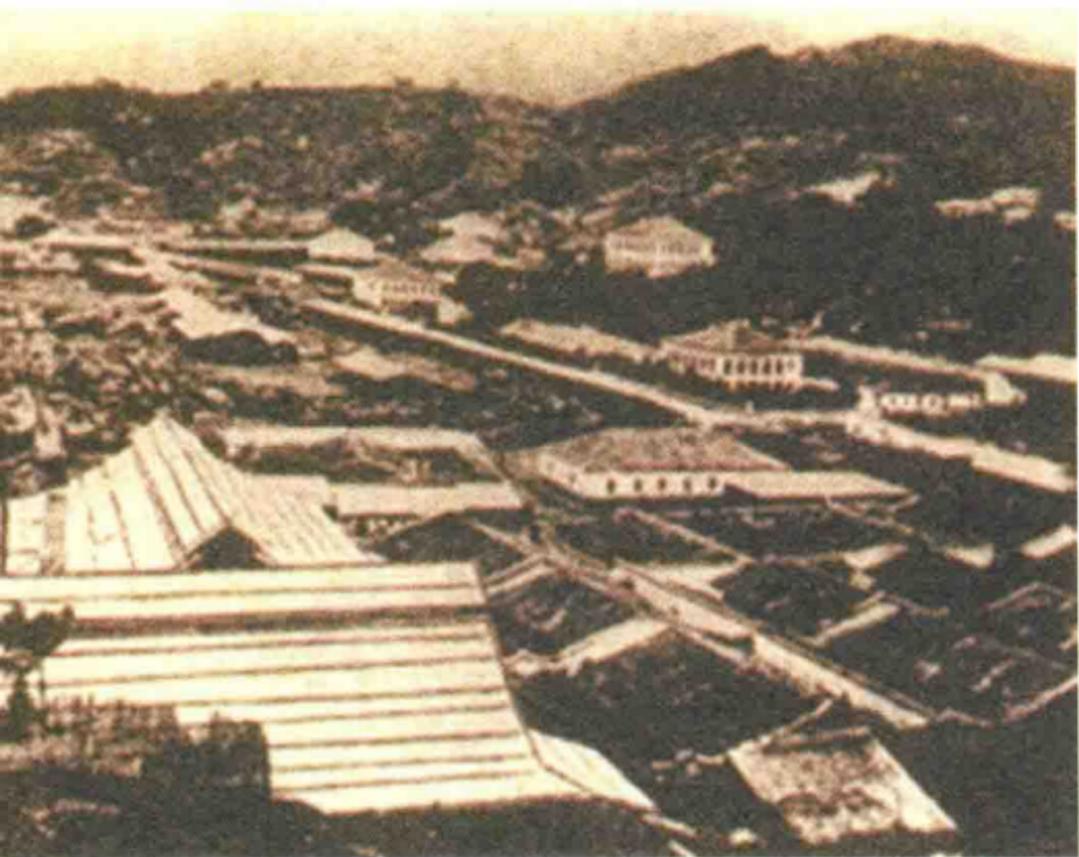
官商合办，抑或官督商办，其结局与后果及个中甘苦，真是非局中人，亦难以与外人所道。徐润年谱中透露出的生动细节，至今仍令人可圈可点，可悲可叹。

徐润在48岁时，筹金数万开办南京书肆，初虽获利，却因经营人员不慎：“为灯火所误，以致失慎，全肆俱付一炬，荡然无存。”徐润慨叹曰：“时运之否，莫

此为甚。”49岁，与友人共股经营茶叶生意又亏数万。50岁，与唐廷枢等出喜峰口，考察矿产。51岁，赴台湾帮办矿务，水土不服抱病而返。

年谱中逐年记叙50岁以后考察、投资、创办开平煤矿、贵池煤矿、永平金矿、平泉铜矿、基隆煤矿、香山天华银矿、承平三山银矿、建平金矿以及多处矿产。其勤奋之状，认真之态，在年谱中都有生动反映。

年谱中记载与唐廷枢友谊之处颇有生花妙笔。53岁记



开平煤矿创建之初



叙开香山天华银矿一事，就曾对唐廷枢助人不记功有如下的评语：“景翁概不计较，当时香港诸人咸谓唐景翁志量极大，不扬人过，识人之难，怜人之苦，大不易得云云。”并对唐廷枢逝世前后，出现了48乡人送万民伞的动人场景，对其六十寿辰以及死后哀荣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载。

徐在晚年一度被袁世凯起用，重回上海轮船招商局掌舵，虽仍与盛宣怀的势力互有争斗，这些细节的实录，都为研究晚清洋务派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真实的细节。

徐润人生的第一阶段，就是在沪投身宝顺洋行，从学徒到掌门再自立门户的21年，即咸丰二年（1852）至同治十二年（1873）。第一阶段又可分三部分，即学徒期，从15岁到23岁，徐以一个伙计学丝学茶，学习英语，成为账号帮办，打理洋行业务。8年时间，成为一个熟谙洋行事务的业务骨干，其中付出的勤奋与刻苦可以推想。从23岁到31岁的8年，主理宝顺洋行，业务迅速扩张遍及长江中下游，北方各码头并达日本、东南亚等地，徐在24岁记叙中说：“进出并计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洋行中可屈首一指者也。”在这一阶段，他不仅洋行业务得到发展，个人投资亦已展开。经验的积累，资本市场规律的学习，中外贸易的知识，商业的惯例，与官府的交通，都在历练中开眼界得提升。由于买办身份，除了薪水还有佣金。徐润个人资产身家都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积累。31岁到36岁，脱离宝顺洋行，自立门户，成立宝源祥茶栈，并在房地产等方面投资经营，成长为民族资本家，成为上海滩上粤籍商人中的佼佼者。

徐润人生的第二阶段，即受北洋大臣李鸿章札委会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即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九年（1883）从36岁到46岁，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当时官督商办的中国最大经济实体。在这一阶段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旗昌在各码头的用地，为上海轮船招商局发展奠定了基础。

徐润人生的第三阶段，即光绪十年（1884）至宣统三年（1911），追随唐廷枢会办开平煤矿等，在唐逝世后仍对矿产资源多处考察、投资，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对国家资源主权的强烈关注与主权意识。他用了前后10年时间，个人理财，还清旧债，收还抵押的物业、地产。在各种投资中开办同文书局、景伦丝厂，开发房产，虽有亏有盈，总体上是盈为七八，亏为二三。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一代翘楚。

徐润年谱对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唐廷枢、盛宣怀等的各种实录，不啻成为后人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徐润年谱中记载的关于轮





船招商局的实业细节，关于矿产资源的调查实录等，都成了研究那个时代经济个案的宝贵资料。徐润年谱中完整保留的中国派遣留美幼童的四批名单，是研究一这问题的权威史料。徐润家庭成员的结构，妻妾的生活，孩子的读书，亲戚的经济往来等，都生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急速变动时期，中国中上层家庭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走向。

三、唐廷枢兄弟的《英语集全》

说到唐廷枢，珠海人并不陌生，甚至上海人、河北人、天津人，对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唐廷枢在中国近代史上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家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民族保险历史上第一家较具规模的保险公司仁济和保险公司、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钻探出第一个油井、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等。唐廷枢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这个唐廷枢究竟何许人物呢？

唐廷枢，字建时，号景星，亦作镜心，于1832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今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1892年10月7日，逝世于天津。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洋行买办，又是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一生，对创办中国近代民族实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唐廷枢逝世后，时在上海的《北华捷报》发表纪念文章，赞扬他的一生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于此可见，唐廷枢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据传，唐廷枢的葬礼十分壮观，其灵柩由招商局专轮运回，外国使馆、洋行有专轮护送，共计13艘，途经上海黄浦江时，外滩灯火齐



唐廷枢像